

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妇女的实地访谈

——考察特殊地理情境中经济资源取得的特殊弱势群体

宋丽君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城乡结合部是类过渡性社区,是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先头军。此情境中,二元制度性户籍身份、多元职业身份与性别身份共存。受女性主义理论界特殊性对普遍性之反动的启发,本文择取陶村这个典型结合部,以农村妇女为焦点群体,实施深度个案访谈,用她们的话语探究导致农村妇女经济资源取得比较劣势的结构性因素,并初步提出几点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城乡结合部;农村妇女;经济资源取得;婚姻结合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03)02-0016-05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Rustic Women in the Urban-rural Co-joint Areas

——Underprivileged Group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in Particular Geographic Context

SONG Li-ju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Urban-rural co-joint zones, as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may be accepted as the forerunners of the further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 which coexist the binary registered statuses, plural occupational statuses and gender status. Inspired by the reaction of particularity to universality, this article selects countrywomen as the focus group in the Village of Tao, typical of co-joint zones, and carries on deep case review, aiming at finding out the particularly structural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comparatively inferior position of the countrywomen in obtaining economic sources. Finally a few pieces of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set forth tentatively.

Key words: urban-rural co-joint areas, countrywomen, the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marriage pattern

一、研究意义:关注特殊社区类型中的特殊群体

尽管我国社会学界就中国如何选择城市化道路模式还有争议,但可以认为“城乡结合部”这类特殊地理情境是我国城市化先头军之一。它是集镇(或称小城镇)的一种,是城乡两元的过渡和中介,典型地表现为一、二、三产业并存、两元制度性户籍身份(按户籍划分的市民—农民)与多元职

业身份(比如工—农—商)共存。微观际遇中,农民与市民面对面互动,市缘(商品交换)、地缘(邻里)、业缘(同单位)甚至姻缘血缘(亲属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居民的联结纽带,营造出纯粹城乡社区所没有的文化心理氛围。相较于农村社区,它更具有率先迈向城市化所需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心理资本,而通过考察其发现路径、

收稿日期:2003-05-30

作者简介:宋丽君,女,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实践模式,也能为农村发展提供借鉴。根据结合部形成过程中内力与外力相互作用的效果,尝试做出理想类型的划分:第一种是内生型,依靠自然资源,因袭传统发展起二、三产业,与城市确立交换关系,城乡协力塑造了结合部;第二种是外生型,因毗邻城市的地理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所受辐射量大而强,结合部发展起来。“温州模式”与“侨乡模式”接近于前者,而“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更倾向于后者。

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村非农化和工业化。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妇女研究学者以农村社区为研究情境——有的实际上考察的就是结合部社区,深刻论述了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与分化问题,实质上论证了农村妇女职业与经济地位取得的比较劣势。以城市为研究情境考察妇女职业发展的理论框架也搭建起来,却没有明确以城乡接合部为研究情境对农村妇女的实地调查。在今天,结合部中正上演着非农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乡镇企业改革甚至国有企业改革等更多重要激烈的变迁,并伴随着居民身份地位丛的微妙变化,社会性别正是居民身份地位丛的重要范畴。而具体地理情境^①具体分析会发现易被以抽象的社区理想类型为研究范畴、先入为主的实证研究所遗漏的事实,有利于实施能动干预。

二、方法论意义和研究假设

20世纪下半页,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理论界兴起,掀起“特殊性”对“普遍性”的反动。在经验研究中,女性主义学者特别是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表现出对特定地理情境的关注。国内最近又掀起了有关定性、定量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大论争,质性研究强调自上而下归纳分析收集的资料,强调重赋被研究者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坚持建构主义学术态度,许多女性主义学者表现出对此研究方法的偏爱。还有研究社会分层的国外理论家从微观处着手,对情境分层即微观情境下的不平等事实(涉及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做出了相异于宏观分层等级制度的把握与呈现。这些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启发是:特殊地理情境(往往也是一个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特殊群体(往往也是边缘群体或劣势群体)应被重赋描述话

语权。

笔者于2001年一、二月份实施了一次“城乡夫妇职业生涯”问卷调查。按职业采用配额抽样,共调查了150对城乡夫妇,特别在山东省陶村一个典型内生型结合部中,结合结构性问卷对25对夫妇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他们特别是她们职业生涯的记录说明,特定社区中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部分女性在职业取得及流动上的特殊障碍。所以,本文只截取在陶村搜集的资料,以居民婚姻结合模式为线索,以这个典型结合部中的农村妇女^②为焦点群体,用其话语来归纳探究导致其经济资源取得比较劣势的诸种结构性因素。问卷内容已蕴涵了一些初步假设,所以这并非严格的质性研究。

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文中所说“农民”、“市民”指定的是户籍身份,它规定了两支主要职业分流方向——以地养家的农民或进厂劳动的工人,这一点在结合部再明显不过。第二,本文记录的都是典型案例,她们只是结合部妇女群体的一支;只力图写实性描述微观情境事实,不做普遍性推论,就群体论群体,分析劣势原因所在,提出建设意见。也无意断言她们身处最劣势,正如本文结合到的结合部下岗女工经历,正如前面引用的有关研究发现,若进行罗列,在户籍身份、职业身份以及性别身份的相互作用下不会只呈现出一类劣势群体。

结合其他学者的理论与发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 1.结合部中户籍制度的分层效应直接影响居民的婚姻结合模式。
- 2.按照交换理论范式,经济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必将带来其它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
- 3.结合部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直接导致了社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性别偏好。

三、城乡结合部个案:陶村经济结构、婚姻结合模式与农村妇女经济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

陶村依靠产煤产陶土的自然资源,在解放前已有多家私陶瓷作坊。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建起了一家二级国营企业,这家企业于2000年宣布破产,现分裂成由私人承包的几家乡镇企业。在此之前,它养活着2000左右的职工(包括村里的

临时工),这个数目与村里农民人数持平。此外,村里还运营着村办的几眼矿井和一家肉鸽养殖场。农民们目睹了下岗职工的困境,“市民和农民没啥区别了”;但人均耕地只有 3 分,“只是有标准的口粮田而已”,多出的耕地被拍卖,市民也能买地。户籍身份分层效应明显,本文就以按户籍划分的婚姻结合模式为线索展开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末陶村居民进行户籍登记,身为市民绝对让吃不到商品粮的“泥腿子”羡慕,农村女青年都以嫁给市民为荣,婚姻模式中的“市一农”结合并不少见,却多是夫市一妻农。这像是老生常谈的“乙女配甲男”现象。笔者曾遇到妻市夫农(他的职业身份实际上是流动电焊工)的特例,男主人 45 岁,委实道出了真情:“我婚前哪想过找个市民,妻子是在婚后顶了父亲的职才转成工人的。”

“农一农”结合更为稀松平常,是门当户对的必然,但丈夫职业身份更为多元,更加开放且富有流动性。首先,社区中的采矿以及制陶的许多工序均属体力型(去年才建了肉鸽养殖场),又受限于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方式更倾向于男劳动力,但女性也曾一展身手。一位 57 岁现同丈夫搭伙经营早餐业的农村妇女对此深有感触:“年轻时因为农业户口陶瓷厂不要我,我又是外地迁入户,没‘后门’可走,只好下井出炭,累是累,那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兴个体承包,咱农民找个活干容易多了。”这同时反映了国有企业破产被私人承包后的潜功能:不要求担负其福利待遇因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农民劳动力似乎能够跟以前的市民一样竞争“上岗证”了。

另外,结合部交通便利,乘公共汽车十二三分钟就可到市中心。男性农民和男性市民的外流行为普遍,迫使陶村个别企业制订了相应的“吸引人才”措施,原则上,劳动力工资应同其文化程度、技术熟练程度挂钩,“但怕男职工跑了,就多给点以留住他们”。男女同工不同酬在经济利润的驱动下具有了合理性。因交通便利,可近距离非农就业,工作时间弹性大,男性农民只是兼业农民,他们也有精力决定安排耕种农田的有关事宜。所以,在农业生产上妻子还是个附属劳动力。^③

再者,自乡镇企业改革特别是被私人承包后,

女工的婚育福利无人问津,甚至出现要么回家生孩子,要么留下继续干的极端案例。一位 28 岁、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女青年,曾在一家乡镇企业做材料化验员。她心里清楚如果做推销,能见世面,还能升职,但尽管文凭较高,她换工作的要求仍没被批准。1999 年婚后,她担心工作环境影响生育,要求单位给换个工种,单位不同意,她一气之下辞职回家,2000 年底生下一女孩。她说:“刚开始并不想要孩子,还年轻,还想学些东西,但即使不要孩子也不会跟城市人一样有机会改变现状,所以还是要了个孩子。”非农就业机会紧缺成了乡镇或个体企业的杀手锏,“怀了孕也要干,不干不发工资,甚至会丢掉工作。”这是位市民身份女工的不满,由怀孕到生育,就业资格被剥夺,更不用提先前的福利(带薪产假)了。这种先后对比产生的愤怒的被剥夺感,可能是因农民身份而从未享受过福利待遇的农民临时工所体会不到的。

上述因素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丈夫的劳动交换价值更高,且因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将农民纳入操作范畴,上有老、下有小,家中有耕地,在核心家庭这个利益单位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妻子合情合理地认同了“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分工。即使是家庭经营的夫妻店,妻子也以附属地位自居。有一对开拖拉机搞个体运输的刚过 30 岁的农民夫妇,丈夫驾车,妻子跟车,轻则为丈夫指挥方向,帮着装车卸车也是常事,她却说自己没收入,只是跟着丈夫干。再问及“公事”的参与,因性别也有着明显差异。亲友的红白喜事是小公事,夫妇谁有空谁参加,或者一起参加;邻里议事或村集体议事需要“户主”亲自出马,“那是男爷们的事”。

“市一农”和“农一农”婚姻结合模式中都生存着务农理家的家庭妇女,她们手里很少握过自己直接赚来的钞票。而她们的邻里和亲朋好友中不乏有每月拿固定工资的妇女,微观情境中这种经济地位的参照与比较使得她们有意无意中已体味到了劣势感。一位婚后一直务农在家的 52 岁农村妇女,表面上任劳任怨整日围着锅台和地头转,内心却爆发着“无名”的不满。她最后悔两件事:一是上高小的时候,在奶奶的支持下她不顾老师再三规劝而辍学——“否则就不会只能种地了”;

二是出嫁后,看到婆婆进厂做工遭人歧视被迫回家,自己也没了找工的念头,和婆婆料理上下十几口人那个联合大家庭的饭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地又分家,丈夫做上了一家村集体企业的负责人,收入在结合部中算上层,在丈夫的主张下她仍心甘情愿留守家中。“现在,他爸动不动就挖苦我,说我对这个家没一点功劳。当初不是他不愿意我出去找活干吗?洗衣做饭,浇地上肥,锄草间苗,哪样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家里盖这盖那,邻里亲朋红白喜事,我没少一个脚印。就说照顾孩子他奶奶,他伸过一个手指头吗?”这一个案例透视出3位农村妇女生涯的被塑造,她们未能走出传统观念设置的性别角色阴影——女主内,不需要职业,也就不需要教育。

结合部中还有住着集体供暖供水单位楼房的“市—市”结合者,曾经的福利待遇换成了张张待岗证或上岗证,曾经的户籍身份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和经济优势地位虽不是丧失殆尽也已丧失大半,异地求职被迫启动,学着适应同农民竞争上岗的社区情境,学着适应那些户籍身份是农民但职业身份早已非农化了的人们的流动生活。在这种被迫流动中,也有妻子认同于依附角色。一对同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夫妇2000年先后待岗,丈夫利用社会关系搞起了仿玉器加工,庭院成了加工作坊,妻子搞加工,丈夫跑路子跑销售。询问个人收入时,妻子表示没收入,一切都是靠丈夫。同时户籍仍有分层功能,市民子女上不了大学还能考个技校,准确地说,可以少花点教育投资就可让子女读个技校,因为农民子女为读技校或找工作而花钱买户口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就早已有了。经济资源体现出强有力的功能转换性——这正是农村妇女比较缺少的,它被转换成对其他资源或身份地位的获取。

四、假设检验与问题反思

3个研究假设皆为微观情景事实所验证。第一,户籍制度的分层效应首先表现为两元的职业分流、经济资源分流和福利资源分流,继而产生3种婚姻结合模式——“市—市”、“市—农”以及“农—农”,这相应构成一个被居民认同的等级体系。相对于“妻市—夫农”,“夫市—妻农”结合的

更普遍性也验证了国内外许多学者论证的“男性在职业市场上求流动,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求流动”命题。婚姻结合上男强女弱是传统角色分工及其导致的女性对生存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占有的劣势所致,这早已融入社会性别规范,为居民认同,反映了女性的一种依赖心理和她们对附属地位的认同。随着国有企业破产、乡镇企业改革,以及全国范围渐进的户籍改革措施,结合部居民的身份认同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婚姻结合模式及其等级体系面临着如何微妙的重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第二,经济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必将带来其它资源取得的比较劣势。在经济理性强烈反弹时期,经济自我更有交换价值更有利润可图。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政治地位占主导,政治分层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地位上升为中国的主导,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大大上升^[1]。国内妇女研究领域则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论证妇女的经济地位是其地位丛之核心。虽不能由此断言处于经济劣势甚至无势的农村妇女在私人领域毫无权力,但经济资源有强大的功能转换性与补偿性,可以改变先赋身份,可以底气十足地承担起社交与政治身份。

第三,受限于结合部的自然资源,其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决定了产业结构,决定了非农就业机会的性质、质量和数量,产生了社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性别偏好,再生了分别以男女性别为标签的公域与私域,再生了女性的经济劣势以及她们和结合部居民对这种劣势的心理认同。结合部也曾因制陶传统辉煌过,但设备老化、劳动力素质低日益成为瓶颈,就业方向重体力轻技术,重劳动力数量而轻质量,自然妨碍她们竞争就业机会;因生育导致阶段性就业,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缺失终于使她们宁肯选择回家,再生了“男外女内”分工模式。结合部依赖自然资源,经济呈非可持续性发展,恪守降低劳动力成本赚取利润的经济法则,漠视女性特殊生命事实,或干脆让其回家;社区劳动力市场向男性倾斜创造着“户平等”的社会事实,捍卫了性别等级制^[2]。

同时,有4个问题让我反思,给我启发:第一,职业性别隔离的社会认同。女性不能干销售,似乎是因

为她们不能或不便于进入一种社交圈,可为何就没人质疑这种看似平常或正常的沟通交流方式的合理、合法或健康性呢?第二,劳动力过剩导致生产单位对就业者合法权益的无视。尽管表面上农民有了宽松的就业环境,却让人喜忧参半,这无意识中以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了交换代价。第三,青年农村妇女自觉的教育需求——这种战略性性别需求得不到满足。教育资源匮乏首先取决于结合部创造教育机会的资金不足,其次反映了相关机构组织的工作责任心不够,认识不到这种教育需求有拉动消费的可能,有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认识不到提高居民特别是处于经济劣势的妇女的文化素质是实现整个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必须途径。第四,尽管有社区理想类型的正统划分,但抽象的类别范畴落实到具体的地理情境就会呈现多样性,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本质原因和表现形式,探讨妇女的劣势地位落实到微观情境,更有利于刨根问底,解决问题。

五、结论

本文微观描述并解释陶村的婚姻结合模式和社区劳动力市场,这有利于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实事求是地进行有效能动的干预。结合部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被赋予了行政管理职权,同时就应承担起发展社区特别是发展居民的责任义务,把性别意识纳入实际工作的开展,应调动各方组织资源,共谋发展。为满足实用性性别需求,当前应先利用自然优势,创造劳动力密集型且劳动强度小的就业机会;切实监督诸企业依法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应认识到农村女性在社区多元参照系下的心理磨砺,以及她们对弱者身份的认同,也恰恰可以方便地引用多元参照系来塑造自强自立的社区文化心理环境,打破根深蒂固的认同心理;根据居民现有文化水平开办多层次社区培训班,既要

着眼于农村妇女的实用性性别需求,也要高瞻远瞩着眼于她们战略性性别需求。

但正如本文一直明确指出的,因焦点群体所限,仅描述了在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社会性别制度以及结合部的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等多项因素的作用下,部分农村妇女经济资源取得比较劣势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心理认同共同导致的依附地位,未顾及到结合部中相对处优势经济地位的农村妇女,而对她们的“焦点访谈”恰恰会给我们以信心。一切都是不断被建构、被生产的,建构和生产工序可以被主体改变,如何认同身份地位也由主体选择,关注特殊情境下的特殊群体,社会研究以人为本,还有很多工作等待着有责任心者和有责任心者去开拓。

注释:

- ① 在本文中,“社区”概念多次被“地理情境”概念替换,意在强调尽管有社区理想类型的正统划分,但即使属于同一类型,彼此之间在自然资源、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也会有其特殊性。比如本文考察的这个北方地区的结合部,就少有苏南那样的家庭手工业作坊。
- ② 本文的焦点群体“农村妇女”是指已婚、尽管职业身份多元但户籍身份仍为“农村”的城乡结合部中的女居民。
- ③ 任青云、董琳在“农民身份与性别角色——中原农村‘男耕女织’现象的考察”一文中就详细地考察了在其中丈夫多身为兼业农民从而对家里的农业生产更有发言权的张家沟村。《平等与发展》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版。

参考文献:

- [1]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J].社会学研究,1997,(4).
- [2] 笑冬.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J].社会学研究,1999,(5).